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

张西平

对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一直是中国比较文学领域关注的重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乐黛云先生就组织出版了10卷本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2002年钱林森先生有组织出版了10卷本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近年来乐先生又组织出版的15卷的《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和《中学西渐丛书》，应该说，在这个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始终处于兴奋的状态，不停的耕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我现在仍认为如果继续深入展开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有两个问题比较重要。

一 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基础是这种文学关系的历史事实，没有这个基础性的研究，整个研究的展开犹如空中楼阁。葛桂录说的好“中外文学关系史或交流史研究，首先属于史的范畴，而史料是一切史学研究的基础。”我们要探讨外国文学家在创作中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这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知道国外的文学家们阅读的是那位汉学家的翻译本，这个问题搞不清楚，我们对外国作家受中国影响的研究就很难说的准确。例如，德国汉学家库恩将《红楼梦》翻译成德文时，将宝玉、黛玉、宝钗之间的故事翻译成典型的西方三角恋爱的关系，由此而影响了一代人的读者。这样，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在德国的影响就要研究库恩的翻译和他的译本特点。这实际上又进入了海外汉学的研究和翻译研究。

到目前为止，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并没有很清晰的完成中国文学文本在各国的翻译历史的研究工作，据我所知，大约只有日本中国学研究的进展比较理想外，这样基础性的研究在各个不同的国家进展是完全不一样的，总体上，这样的基础性文献梳理工作还完全没有完成，即便对英国和美国这样的英语国家来说也是这样。在我看来，对域外汉学史的研究应是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展开的基础性学科，但很遗憾，虽然我们现在翻译了大量的国外汉学著作，但真正写出国别汉学史的著作没有几本。有些国家的汉学史已经写出，但是完全不可以用于学术。因为，对域外汉学的研究的展开是在跨语言、跨学科的背景下展开的，真正进入这个学科的学者并不多，而且展开的时间仅仅才三十年时间。这样，大

葛桂录：《亟待加强中外文学史料学研究》

量的重要的汉学家的个案研究都没有人去做，国别汉学史研究中的学派和断代史研究更是刚刚起步这样。从对国别汉学史的研究到到中国文学外传的研究，还这需要学科展开的进一步深入。但在总体上，我感到除个别国家的汉学史研究、中国文学外传史研究较好外，绝大多数的研究正处在研究之中，尚不能给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提供很理想的学术的支撑。作为跨学科研究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如果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不能提供很好的学术支撑，仅仅依靠比较文学研究者来完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谓的跨学科就在于要吸收其他学科的学术成果和进展，这实际上涉及到我们人文学科的整体进步和相互影响问题。再大一点说，在中外文化交流史领域，至今也还没有一套比较权威的文化交流史的著作，这同样给我们的写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在这个意义上尽快建立中外文学关系史史料学是十分必要的，从目录做起，从编年做起，将中国文学的外传的基本情况摸清，这样做起来才会使学术不断积累起来。

第二，跨文化理论的构建。从史料而言，历史学是科学。研究者必须对每条史料的时代、内容说的清清楚楚，这是容不得一点马虎的。但对史料的解释有赖于历史的书写者的观念和立场，因而有人又认为历史学是艺术。兰克在《历史科学的特征》中说：“作为科学，历史与哲学相关；作为艺术，历史与诗相关。”兰克的这个解释成为历史学的解不开的难题。历史的事实属于科学，历史的解释属于观念领域。“史料的发掘”和“观念的阐释”成为实证史学和后现代史学的的分水岭。后现代史学大体是沿着“观念的阐释”这条路发展起来的。福柯对结构主义的挑战，他说：“回顾过去，我曾以为自己在研讨知识‘系谱学式’的历史。但是真正的驱动力量实际上却是全力的问题，……最终我只营造出权利的历史。”权利就是历史解释的主体性问题，这样知识系统的历史实际上是被解释者所塑造的。在历史和文本之间，在文本和语言之间，德里达又进一步向前推进将历史化为语言，当他提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时，作为事实的历史和作为叙述的历史就完全对立了起来，文本成为一切，而组织文本的语言成为核心。

其后的赛义德的理论只是将后现代理论运用到东方学的研究，他的全部理论和建树，在我们看来不过是为后现代理论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已，在其基本理论上并无太多的创造。

福柯、德里达的后现代理论是目标在西方，赛义德将其引入东方学中，开始有了一个跨文化间的理解、解释问题。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涉及到东西两个方面的问题。对西方来说，这是西方眼中的中国，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对东方来说这是中国眼中的西方，东方的西方形象问题。如果套用赛义德的话，在西方有个

“东方主义”，那么，在东方是否有一种“西方主义”呢？如果能将这些历史置入中西方的文化史和思想史中研究这两个问题，这几乎涉及到中国和西方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全部问题。

如何构建一种全新的跨文化理论和话语系统，解释文化之间的接受、变异，这是摆在丛书撰写者面前的大问题。以往，在理论上，中国学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创造，都是在跟着西方的理论跑。西方有了什么新理论，我们马上介绍过来，然后用其解释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种对西方理论的学习当然有价值，但如果在贩卖，只是在套用，久而久之就会看出我们自己在理论上的苍白。炫耀的新词，变换的理论都掩盖不了我们自己在理论上的贫瘠。

《跨文化研究》具有很大的前瞻性，因为，在比较文学的框架中已经很难适应目前的研究状况，从跨文化的角度展开文化之间的文化间的研究是必由之路。

《跨文化研究》是中国学术界最早开辟这个研究领域的。

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个伟大的国家将重新出现在世界学术之中。从中国方面来说，如何摆脱西方殖民思想，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出发，确定自己的基本文化价值，并在与外部文化的对话中提升出具有普遍性价值的观念，这是我们文化重建中的重要使命。跨文化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化的重建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对正在从事中国思想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学者来说是十分有价值的。由于长期的学科分类，跨问研究的一些基本观念并不为这些研究领域所知道，更谈不上所应用。他们大都在原有的单一学科范围思考。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认为跨文化研究对整个中国文化的重建，对中国学术的全局有着重要的价值。

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稳定一面和变化的一面够成了基本特点。有的学者只看到其稳定的基本面，似乎找到先秦时期我们的文化原点就可以在这个原点上重建中国文化。这样的努力其价值在于对中国文化基本点的探索，因为，很长时间来，我们这样的工作做的不够。但仅仅有了原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在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融合。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基本面的影响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传入所对我们文化的影响如何看待仍有着重大的分歧。梳理近代中国文化的变迁过程的研究正在进行中，从言语、词汇到观念、制度，近代文化看上去几乎和传统文化发生了断裂。在文化自觉的倡导下，返回原点，清理近代西方的影响的做法已经被一些学者从事。我们能返回原点吗？但我们能忘记原点吗？我们需要全盘接受下近代文化的遗产吗？我们能绕过近代的文化遗产吗？

纠缠于中国文化重建中的这些问题亟待跨文化的理论给予指导。从中国历史

来看，她本质上就是一个在其原点文化形态下的不断与外来文化对话，更新发展的文化。中华民族的融合史，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学习、接受史给我们留下了跨文化的丰富遗产。仅仅佛教的传入和接受，及其中国本土佛教禅宗的产生就给我们留下了文化之间交流、融合与吸收的非常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从晚明以来西学的传入和接受的四百年历史更是个给我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化之间交流、融合、对话的宝贵学术遗产。近代这四百年学术遗产也使我们可以从根本上反思西方文化的特点、问题。

我这里的想法是，在跨文化研究方面，中国自身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和学术遗产，对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认真的梳理、研究，就可以走出我们现在那种凡讲理论全是西方的，在研究的基本理论上无根基、无特点的局面。这样讲不是说西方的跨文化理论不能吸收，我们只有了解他们这种理论，我们才能与其对话，我们只有了解这种理论我们才能有所超越。

但现在对我们来说，我们对自己的这份跨文化的历史遗产重视太不够了，我们基本上不能从自己的文化史中总结出有特点的跨文化理论。没有对中国与外部世界文化交流史的系统研究，没有对近四百年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认真研究，要想建立所谓的跨文化中国学派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拿什么理论到西方学者面前呢？我们为何守着世界上少有的跨文化历史宝库和最为丰富的跨文化学术遗产而对其无动于衷呢？

从南京会议后，我算是在组织形态上进入了比较文学研究这个领域，在我对比较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主要受其启于乐黛云先生、严绍璦先生和孟华先生，因为住在同一座城市，交往自然很多。钱先生邀请我参加这套书的写作，但在写作中这两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在这里写出来向同行们求教。